

第一章

嘉道咸时期的时代背景

时至今日，令人难忘的鸦片战争被视为中国近世衰落和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端，这种观点得到普遍的认同，或者说，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压和凌辱更容易与中国的衰落相联系，产生因果的关系。由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主权的逐渐支离和经济上广泛、纵深掠夺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统治机制的改变，加剧了社会贫困的普遍化，尖锐的阶级对抗甚至战争的爆发使得清朝政权岌岌可危，衰落的表象已是路人皆知。由此而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和它在初期发展时所特有的扩张性和掠夺性，对 19 世纪之后的中国产生了特殊而深刻的影响，使中国开始走出传统封建制度的社会模式，逐渐接受资本主义的因素，演化成近代中国特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除此之外，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制度的变化还受到社会内部各种因素的作用，换句话说，正在衰落的清王朝失去了抵抗西方强权侵略的能力，而社会内部因素相互作用是清朝政治衰落的主要原因，这些政治、经济、社会的复杂原因是社会矛盾的动因，也是社会变化的基础，并最终决定了社会的走向。

第一节

嘉道咸时期的国内政治社会背景

康雍盛世之后，历经白莲教起义的涤荡，昔日万里海疆、无比强盛的图景突然间变得满目沧桑，社会动荡，人心支离，政治统治和潜伏于社会的危机迫在眉睫，时人不免感慨万端：“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政治、社会秩序衰落、民心的散离以及普遍的穷困化给嘉庆以后的社会蒙上了阴影，而在道咸时期继续恶化。鸦片战争前，黄爵滋曾描述当时的社会：“今论者有曰：邪教可虑也，会匪可忧也，灾黎可悯也，岁荒可惧也，兵弁多无用也，海洋多莫测也，外之鲜爱民之官，而内之鲜敬事之吏也。”^②鸦片战争后，“人心之寐患”^③，“人材之虚患”^④，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④国家的前途暗淡无光。

嘉道咸时期的学风和文化思想也正处于大变动的时期。政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06 页。

黄爵滋：《综核名实疏》，王延熙：《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75 页。

魏源：《海国图志·叙》，光绪二十四年文贤阁石印本。

龚自珍：《与人笺》，《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340 页。

治衰落相应减少了对学术的钳制，学术空气从文字狱的恐怖时代解脱出来，转趋活跃，甚至“对于政治及社会的批评也渐渐起来了”^①，政治氛围的变化是影响学术趋向的一个原因^②。以嘉道时期诸多的社会问题和道咸时期西方列强的侵扰为背景，学术风气和文化思想也由乾嘉时代的“训诂考据”向道咸年间的“经世致用”直至向西方学习的转变。社会的变迁影响到学术及思想思潮变化的轨迹。以社会为中心，学术及文化思想思潮才具有活力。魏源的《圣武记》的写作目的即在于“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当然他也同样感到来自海外的威胁：“晚侨江、淮，海警飏忽，军问沓至，忼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④。探求和解决社会问题成为当时学术和思想发展的主流，当然其中不乏对现实政治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 1985 年版 第 25 页。

② 知识界在思想方面的新动向，高翔认为在嘉庆以前就已经出现，他认为：“18 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并不像一般史书所描述的那样沉闷而无新意，正是在封建社会“全盛”的特殊环境下，知识阶层出现了以批判传统观念为特色的新的思想动向，其基本特点是：在生活方式上，主张人性自由，鼓吹妇女解放；在学术上，反对理学和汉学的垄断地位，推崇独立思考，重视西学的价值；在政治上，否定君主专制，强调臣僚独立政治人格。”《论十八世纪中国知识界的反传统倾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第 88～95 页。

④ 魏源：《圣武记·叙》，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第 1 页。

的批评^①；除了社会和政治原因之外，思想和学术的演变也受其自身规律的影响，以乾嘉学著称、颇具训诂考据特色的汉学，在乾嘉时期臻于极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之后，详实之余，支离、繁琐之弊也显露出来，同时因其脱离现实社会而受到嘉道时期兴起的“经世致用”学风的挑战，并最终被其所代。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宗旨的“经世致用”学风，“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纪世匡时”，一反乾嘉学风的埋头考订而把学术引向关注政治、改故鼎新的轨道，由于其颇多的为时代需要的观点，对于其后的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

一、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

在跨越中世纪的宗教和专制的君主统治以后，西方文明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具体来说，在科学、技术、思想、哲学、社会理论、文化等方面的成就之上，奠定了西方社会跨入资本主义的基础。以此为基础，18世纪欧洲各国相继迈进资本主义的行列，开始领导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世界文明的方向，所以这一时期的

王伟均认为：“纵观龚、魏等人的著论，不同于前人的奏议，不同于早期的公羊学者仅限于经生之业，也不同于昔日的论史者仅于事后评论，以资来日的鉴戒；而多就当今的事变而言，开启日后的时评、政论之风。”

《清代中叶士大夫之忧患意识》，《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 第10页 转引自王 钱生：《台港清史研究文摘》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362页。

成就格外引人注目。

16 世纪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开始有了明显的优势。实验逐渐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由于多种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然科学的体系，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及在生产技术方面的不断应用，为 19 世纪初期欧洲产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当然科学的发展还具有认识方面的意义，由此建立的对自然世界的逐步客观的认识代替了宗教的迷信，同时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这些成就中，牛顿对于物理学的贡献，其科学理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尚未受到挑战，当然也影响到其后 100 多年的哲学思想。罗伯特·波义耳在化学方面的专著《怀疑的化学家》把化学提高至一门纯科学，并提出了化学元素和重新探讨原子学的问题，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其他诸如生物学、医学也都有诸多的成就^①。

与科学技术为先导的工业化的发展并行，西方的社会进步，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社会运动，无形中将欧洲人的思想从中世纪教会的樊笼里解放出来。十四五世纪以来新航路之发现促进工商业之发展，间接摧毁封建制度与传统势力。”^② 这些成就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反之，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工业和商业的高速进步，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宗教、文艺、哲学、思想、伦理及社会发展理论等方面，也

参阅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 2 卷 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第 22 章。

王政：《社会问题的连续性》（台北 正中书局 1964 年版 第 16～17 页）。

都出现了跨时代的进步，形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风格和特征。这些精神上的财富在继续发展的同时，不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甚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至今仍受其影响。

西方近代文明是西方科学、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理论多方面长期发展的结果，14 世纪前期出现的马塞流理论，提出了人民主权论的理论，核心是法律是社会公正、秩序的依据，全体人民或人民全体的主要部分是国家的立法者^①。在其后产生的资本主义不正是把民主、法制理论奉为其政体的核心吗？还有 15 世纪的马开外里的共和制学说，18 世纪卢梭的自由理论^②，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理论基础。启蒙运动是 17、18 世纪欧洲思想革命的顶峰，它所倡导的唯理论对驱逐欧洲的政治暴政和教士的特权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宗教自由的理想促进了欧洲摆脱宗教的束缚和教会与国家的分离；社会中自然秩序的设想提高了人民对推翻封建残余和垄断等制度的认识。

以此为基础，18 至 19 世纪，欧洲大陆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9），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60），不但是近世西方文明进步的结果，也是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开端。虽然欧洲大陆不时受着战争的困扰，但是资本主义以锐不可当的势头迅速发展。特别是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英国、法国、日耳曼和意大利等国先后深化了国家和政

国立编译馆：《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 1984 年版，第 100 页。

同上，第 177 页。

参阅【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 2 卷，第 309 页。

治的民主，议会、男子普选权和内阁制度是这种民主的具体表现。作为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成果，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只是人类社会文明中的一个过程，但对于中世纪专制和宗教来说，它毕竟是一次时代和文明的飞跃。所以伯恩斯认为：“过去四个世纪以来所孕育的各种倾向达到了顶峰，引起了从希腊人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迹般的变革。法国革命聚集了这些倾向中的某些方面，使它们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在世界上发挥了巨大威力。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和反抗专制君主制度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商业革命和产业革命比法老以来任何‘决定性战争’更为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作了准备。这些力量是如此势不可当，它们的影响不仅局限在欧洲和美洲而且最终扩展到远东。”

二、工业化的时代

资本主义是工业化的时代。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蒸汽机、各种动力织机以及其它机器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法，具有工业化特征的工厂制度代替了作坊生产。工业化生产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规范化方面都有巨大的优势，最先利用机器获得发展的英国纺织业完全体现了工业化的优势。

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3卷第164页。

同上，第1页。

1821~1841 年英国棉花消费量、棉纱生产量与棉纱输出量统计表：

年代	棉花消费量 (百万磅)	棉纱生产量 (千磅)	棉纱输出量 (千磅)
1821~1825	152.1	136 921	28 350
1826~1830	206.4	185 773	50 602
1831~1835	289.6	257 353	73 509
1836~1840	394.1	349 255	106 080
1841~1845	508.3	424 295	135 064

19 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和殖民地市场的进一步开拓，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持续高涨。自 1830 年以来英国工业增长势头迅猛，50 年代后重工业也飞速发展，用机器制造机器完全代替了手工业的方法，工业总产值已居世界之首，马克思在 1853 年曾说：“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 1850 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① 1848 年后的法国，纺织业和五金业比较突出，美国的工业中纺织和机器制造业发展迅速，1860 年纱锭已增至 250 万锭；俄国也提出废除农奴制度。

工业化的兴起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促进了社会产业结构向多级化的发展。以工业（包括矿业、工业、水电、建设）为主

①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6 卷第 9 版第 486、503 页；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5 页。

导的第二级产业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产业，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社会服务业、银行、金融、保险、运输、娱乐）的兴起和发展^①，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力和日趋完善合理的产业结构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更强的动力。

这个时期，向海外市场扩张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上的一个特征。市场的扩大和进一步开拓市场的要求表现为扩张性，这是资本主义初期普遍具有的特性，当时的落后国家无一不成为其经济掠夺、征服的对象。其结果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②。印度盛产棉花，手工棉纺织业发达，但随着 19 世纪以后英国机织棉纺织品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其成本和质量的优势，向印度倾销。从 1818 年至 1836 年英国出口印度的棉纱上升的比例是 1:5200；1824 年销往印度的细棉布不过 100 万码，1837 年升至 6400 万码以上，因此，印度手工作坊式的棉纺织业基本上消失^③。印度只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进程中的一个个案，其他落后的国家无不像印度一样，在先进工业和武力的打击下，先后并入资本主义世界近代国际秩序。

黄建华：《道光时代的灾荒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食货月刊》第 4 卷第 4 期，第 27 页。转引自王 箴生：《台港清史研究文摘》，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08 页。

②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287 页。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5 页。

第二章

嘉道咸时期的政治状况

历时嘉道咸三朝中国社会的走向，是一项受到多方因素牵动的社会转型工程，其中当时复杂的政治态势与社会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特征及其变化线索的考察，对于理解社会走向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从政治角度考察，时跨嘉道咸三朝 60 余年的清朝，有两条线索比较明显：一是政治衰退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由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减少，迫使不断开辟新的财源；同时，地方对应上缴中央赋税的截留不断增加；另外，专制统治的衰落伴随着地方政治势力的崛起，地方对补选官员权力的干预逐渐增大，财政自主权的增大等等，这些现象表现了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削弱；再是为扭转国家日渐衰落的颓势而出现的改革呼声和从上至下形成的改革势力及实践，虽然各个阶层对改革目的见解不同，甚至改革并未取得显著的成就，但这是整个民族觉醒自救过程的一个阶段，改革的实践不仅疏通了某些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窒碍，加上鸦片战争以后外强进逼的态势，唤醒了全民族的生存和变革的意识，自然也培养了越来越多具有新思想的改革家，为社会的变革起到铺垫作用。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衰落的不平衡关系

与清朝前期不同，自嘉庆以后，至高无上的皇权渐渐失去昔日的威严，虽然各种制度的形式依旧，但是执行的效率则大为减弱，制度多成具文，进而影响到政治机制的衰落，由此进入了清朝统治衰落的时期；与此相反，社会经济表现出日益发展的趋势，在经济结构、商品生产和贸易方面都出现多头并进的势头，而且互为动力，达到了清初以来未有的发达阶段，表现了和政治机制的变化完全不同的机制和趋向。

各地不同的经济结构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发生变化。乌程产棉不多，但纺织业却异常发达，“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闲。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成布一匹……男妇或通宵不寐。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②。乌程只是一个例子，事实上南京、上海及周围地区都

姜守鹏认为，乾嘉道时期是传统经济结构变革的时期，其表现是：第一，私有制的加强与封建地主所有权的分解，第二，小生产者商品性生产的增强与资本主义萌芽对旧有生产方式的冲击，第三，区域性、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与大商巨贾势力的增强。《清嘉道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清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1~7页。

宗源瀚等（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九第5~6页。

是棉纺织业集中的地区，贸易是其主要的目的。纺织业在乌程经济结构中比份极重，已经完全与农业相匹敌，单一的农业型经济已为多层次的农工商并举的经济结构所替代；大量的纺织产品需要相应规模的市场作为媒介，才能使生产持续发展，纺织市场的扩大也必然依赖于大规模的产品，乌程纺织业已经具备这种规模，这是长期经济发展积累的结果；农业在乌程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只能维持“输官偿债”，而纺织业却成为生活的依托。

这时期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业规模的扩大，私营商人的资本也相应迅速增加，虽然这些人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已成为一支很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阶层。以上海为例，其中比较显著的是经营沿海贸易的商船主，“沪之巨商不以积粟为富。最豪者，一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驶至关东运贩油、酒、豆饼等货，每岁往返三四次。偶失于风波，家可立匮”^②。从投资趋向上看，这些大商人不把商业利润按传统的方式投入土地或储存粮食，而是再购置商船扩大运营，所以一旦遇风遭险，便会资产尽失。

在上海经商的商人中，除了上海本籍的商人之外，也有大批闽粤商人在此经营，广东商人“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于沪则收买木棉载回其地”^③。这些跨地区经营的商人，经营资本多达数百万金，可以说明商人势力的壮大和发展，而且商人的不断发展，也控制越来越多的进出口贸易的利润，所谓“黄浦之利，商贾主之。每岁番舶云集，闽、粤之人

① N.C.H., 1850 年 8 月 31 日 第 19 页 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1334 页。

王韬：《瀛壖杂志·瓮牖余谈》岳麓书社 1988 年版 第 12 页。

同上，第 13 页。

居多。土著之远涉重洋者，不过十之一二，皆于东城外列肆贮货”^①。闽粤商人已经成为上海地区贸易和经商的主要成分。江浙、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的变化，使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也促进了该地市镇的发展。清代以来，该地市镇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而且这些城镇的经济商业地位日趋重要，成为周围地区的经济和商业中心，虽经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但这一趋势保持不变。

自清初以来长期受到压制的采矿业，在嘉庆以后逐步发展。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江西等省的煤、铁、铜、铝、锡矿一般都听任民间开采，采取“任民采取，征税银二分”的办法。云南矿产丰富，大矿有近 50 处，每一矿雇佣工人都在万人以上。采矿规模较大，“非数人所能采取，亦非数月所能毕事”^④，所雇工人多为流民，松筠请开矿禁的理由就是“贼不患不平，而贼在既平之后，请弛私盐、私铸之禁，俾余匪散勇有所谋生”^⑤。矿业的发展为社会带来的利益，甚至得到道光帝的首肯，“我朝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处，向有银厂，每岁抽收课银，历年以来，照常输纳，并无丝毫扰累于民。可见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是以藏富

王韬：《瀛壖杂志·瓮牖余谈》第 13 页。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数量分析》，《思与言》第 16 卷第 2 期，43 页。转引自王笈生：《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第 221 页。

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食货月刊》第 7 卷第 11 期，第 36 页。转引自王笈生：《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第 223～224 页。

《清仁宗实录》（一）卷四十三，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第 519 页。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二，《松筠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1115 页。

于民之道’^①进而指示地方官‘体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场民间情愿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②。不仅是矿业，当时的采伐厂也常是三五千人，粗具规模，陕西有 20 多家造纸厂“，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③面对规模渐大的工商业压抑已完全不起作用，道光时期的开禁更反映时代的趋势。

社会经济的发展，结构的变化，除政治以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广州成为惟一的外贸口岸，外贸商务云集此地，商业的高度繁荣是广州的特点。不但外销货物集中于此，而且内地货物也多在此集散，广西省所产桂皮量大质精，年运广州达一百二三十万担，其中外销 80 万担，内销四五十万担，占 1/3 强。内、外商贸的繁荣也促进了消费，道光时期广州有 30 多万户，加上流动人口，估计人口在 200 万以上，仅生猪一项“，每日销大小猪五千余只，计年间生理银两，约有一百五十余万之多”^④。由此可见，位居商贸中心的广州，其较高的生活水平是为广州经济发达的标志。

就区域而言，南方经济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而北方的经济虽不如南方，但也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势态。直隶宝坻县位于北方，道光时期的商业已有明显发展“，昔年无卖估衣者，今则不但外来之商贩，即质库质不能出脱者，亦零星卖之矣。昔年之小饭铺，不过逢市集之期，卖麻花、烧饼、活络之类，今则有小楼之名，

《清宣宗实录》（七卷四百零四第 57 页。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二第 20 页。

齐思和等：《鸦片战争》（四）神州国光社 1954 年版第 292 页。

肴饌點心，且包办酒席矣。昔年无卖茶者，今则茶铺不止一家矣”^① 不仅内地的经济和商品生产出现了清初以来较快的发展时期，即使远在边陲的西南的广西、云南地区，无论是与内地的商品贸易、边口贸易以及由此带动兴起的贸易城镇的形成，都标志着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②。

地区性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即使农业生产，也出现了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和经济作物发展的趋势^③。嘉庆以前 棉花的种植“北至幽燕 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极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地”^④ 甘蔗是重要的经济作物 主要在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种植 台湾因产量巨大 销往大陆甚多 广东一些地区“庶田几与禾等”^⑤ 福建的龙溪县“惟种蔗及烟草 其获利倍 故多夺五俗之地以与之”^⑥，经济作物的发展甚至与粮食发生冲突。其他经济作物诸如茶叶、烟叶的种植更是规模庞大，福建武夷山地区的

李光庭：《乡言解颐·人部》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第 48 页。

参阅方慧、徐中起：《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研究》1997年第 2 期，第 96～101 页。

方行从粮食生产、农民耕地规模和农民收入三个角度论述了清代前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他不同意“由于人口增长快，土地垦辟少，出现‘人满之患’、‘民穷财尽’的观点；《正确评价清代的农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第 141～150 页。

李绂：《种棉说》，贺长龄等：《清经世文编》卷三十七，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第 917 页。

李调元：《南越笔记·蔗》卷十四 转引自郑天挺：《明清史资料》下册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248 页。

⑥ 《龙溪县志·风俗》卷十六。

茶叶久享盛誉“商贾云集 穷崖僻径 人迹络绎 哄然成市”^①。以上几方面的叙述，无不反映南北经济的发展，这与当时政治衰落趋势恰好表现出相反的态势。由此可见，社会的演化和政治的变化受到不同的因素支配，清代中期政治和经济不同的趋势恰好表现了这种特征，当然作为政治的一部分，政府控制的国家经济制度也与社会经济的活跃表现出相反的态势。

虽然从整体上讲，清代前期至中期社会经济表现了持续发展的特征，但就不同地区来说，还存在不小差异，因而形成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清初以来长期的和平环境和强有力的控制机制，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在此基础上增强了商品化的趋势，但商品化和市场的发展必然背离重农的国策，在一定时期必然引起限制。但是嘉庆以后不断加剧的政治衰落减弱了专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政治规

① 《云廖山人文钞·武夷偶述》卷四。

② 参阅【日】黑田明伸：《中华帝国的构造与世界经济》他认为：“中国国家经济的衰弱与区域经济的活跃相互之间并不矛盾。”转引自艾平：《日本1994年清史研究概况》，《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2～118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6年第6期第83页。

郭松义在《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一文中，把全国划分出四种不同的类型，即发达地区、已发展地区、开发中地区、未发展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2期，认为乾隆至道光时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观点，将此阶段发展的特征归纳为：一、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及农业商品化趋势的发展；二、农村市场的大幅度增产，尤以华北、四川等发展中地区最为明显；三、新的与近代相衔接的流通格局逐渐形成；四、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扩大。晓棚：《清代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第54页。